

# 日本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 《養兒子》與《小孩兒》 的口語特徵與倫理關懷

許麗芳\*

## 論文摘要

唐通事教材為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中日通商的時代產物，內容與形式皆有特定風貌，除了基本的中國語言學習之教育取向外，並保留了當時中日通商交流的若干史料，其中《養兒子》與《小孩兒》不僅於內容上有異於以往通事教材著重語彙或會話的編寫方式，即以文章形式紀錄當時通事教育與養成等現象，而文中的敘事模式，則呈現了受到中國話本小說的結構與功能等影響。但歷來相關研究不多，多僅就唐通事教材加以分析，如研究其中的若干史實，或語音內涵、語意結構等，本文則擬以《養兒子》與《小孩兒》敘事模式為思考中心，對照明清話本小說與相關類書等之書寫趨勢，以分析此類書寫特徵與敘事結構，分別由一、常民知識的博物書寫，二、通事學養的議論對話及三、承襲新創的通俗脈絡等面向加以探討，以期由此類通事教材的形式特徵與內涵理解當時中日兩國文學傳播與文化交流之一端。

**關鍵字：**通事、話本小說、議論、入話、說書人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前言

唐通事教材為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中日通商的時代產物，由於通商所必需，於 1604 至 1867 年間在唯一通商口長崎設立唐通事，其後薩摩藩等地亦有設置，負責與中國進行貿易時的翻譯工作。通事有不同職級，執掌翻譯、貿易、外交及維護秩序等。<sup>1</sup>由於擔任翻譯工作，相關的語言教育與通事教材也於此時空背景之下產生。唐通事使用的語言是當時被稱為唐話的中國白話，其學習教材雖由漢字寫成，但強調白話口語，故自成系統，與文言的儒學教育有所不同。<sup>2</sup>另一方面，此類唐通事漢語教材不僅與中國漢文相關，也與傳入日本的中國古代小說密切關聯，江戶時期以長崎為中心的中日通商活動使傳入日本的漢籍不僅數量多，種類也由以往的詩集擴大至明清通俗小說，<sup>3</sup>當時傳入的白話小說中尤其以《三國演義》、《水滸傳》及《三言》、《二拍》等受到歡迎，並且有翻譯或改寫版本產生。<sup>4</sup>此類小說所具有的生活化口語，成為唐通事學習唐話的重要材料，對於學習開口

<sup>1</sup> 通事有按察通事、大通事、小通事、學通事（即稽古通事）、唐年行司及內通事等職級，據日本仙臺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本《瓊浦佳話》卷一與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 卷 3 期（1999），頁 461-4。

<sup>2</sup> 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 卷 5 期（2007.9），頁 46-47。以為通事所學習的中國白話即唐話，並非當時儒學文獻所使用的文言文書面語，其人乃以訓讀法閱讀，所謂「不識中國音，卻認中國字」，而通事因翻譯職務所需，學習取向有所不同。

<sup>3</sup> 據田中謙二、松浦章編著，《文政九年遠州漂著得泰船資料》，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文政九年（1826）中國得泰船朱柳橋與當時日本儒者也是漢學者野田笛浦（1799-1859）筆談說道：「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裝至長崎已十之七八」。

<sup>4</sup>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序說，頁 5-6，以為日本漢文學發展史約有三個巔峰期，第一個巔峰期在七至九世紀，即日本的大和、奈良時代及平安初期。由當時的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至中國學習各種文化制度，並帶回不少典籍、文物。第二個巔峰期是十三至十五世紀，即日本的鎌倉、室町時代，此一時代日本僧侶與宋元歸化僧為代表，傳入禪宗與創作漢詩文的風氣。第三個巔峰期在十七、八世紀，即日本的江戶時代。江戶幕府採用儒學思想為其文治政策，故漢學亦成為當時武士的必備教養。政府及一般人常透過前來長崎的中國商船取得中國的書籍、文物。《三國演義》、《水滸傳》及《三言》、《二拍》等白話文學都在這個時期傳入日本。

說唐話具有實質幫助。<sup>5</sup>而此一教育取向也成為唐通事教材形式與內涵之主要影響因素。

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各有階段性的教育功能與取向，由最初練習發音的《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其次由《二字話》、《三字話》、《長短話》學習常用語彙<sup>6</sup>，進而閱讀如《瓊浦佳話》、《鬧裡鬧》、《小孩兒》與《養兒子》等進階讀物。這些教材並無固定版本，皆通事抄寫而習之。<sup>7</sup>可視為中日通商的特定時代產物，內容往往保留當時史實風貌，另一方面，既有研究文獻亦提及，由於中國白話小說亦為唐通事學習唐話之來源<sup>8</sup>，因此其後形成之通事教材無論是長

<sup>5</sup> 如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話》，大阪府文榮堂，出版年不明，所據為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書籍綜合電子資料庫，其卷一云，「我東人欲學唐話，除小說無下手處」「或曰：學唐話，須讀小說可乎？曰：可也。」即意識到小說對於學習唐話有實質幫助。

<sup>6</sup> 據武藤長平，〈鎮西の支那語学研究〉《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頁51-2，唐通事最初讀《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學習唐話發音，其次學習如「恭喜」、「多謝」、「請坐」等二字話，以及如「好得緊」、「不曉得」、「吃茶去」等三字話，進而學習四字以上的長短話，此類教科書有《譯訶長短話》五冊、《譯家必備》四冊、《養兒子》一冊、《三折肱》一冊、《醫家摘要》一冊、《二才子》二冊、《瓊浦佳話》四冊等由唐通事所編輯之書本。進階讀物有《今古奇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等，以及《福惠全書》、《資治新書》、《紅樓夢》、《金瓶梅》等。又據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14，唐通事的教科書最初由《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學習發音，其次背誦二字、三字及長短話等常用語彙、進而學習如《譯家必備》、《養兒子》、《三折肱》、《醫家摘要》、《二才子》、《瓊浦佳話》、《兩國譯通》等由唐通事編輯之書，並學習《今古奇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等，以及《福惠全書》、《資治新書》等。其他教科書有《俗語彙編》五卷、《譯官雜字簿》、《華語詳解》及岡島冠山所編《唐話纂要》、《唐語使用》等八門必讀書。

<sup>7</sup> 據長崎通事盧篤三郎自傳，唐通事教材從《二字話》、《三字話》始，還有《瓊浦佳話》、《譯家必備》、《醫生通話》等，此等書無版本，皆自己抄而習之，轉引自六角恆廣著，王順洪譯，《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sup>8</sup> 相關研究如武藤長平，〈鎮西の支那語学研究〉《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提及養兒子小孩兒二書為通事教材，未有具體分析。喜多田久仁彥，〈唐通事の教本について—《小孩兒》《養兒子》の教本としての特徴〉，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LVIII（2001），則就其教學特徵加以研究，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卷5期（2007），已意識到此類教材與中國小說的關係，其中並提及《養兒子》運用韻文與說話人等形式特徵，但並非專論。廖肇亨，〈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收錄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針對《唐通事心得》分析通事的國家認同與區域意識，其中也提及通事教育書目與技藝訓練等，但全文主要著眼於通事在國家與文化衝擊下所產生的道德期待與文化想像之層面。奧村佳代子，〈唐

篇分卷或單篇成文，敘事模式往往呈現了中國通俗小說之影響，但歷來相關研究並不多，多僅研究其為通事教材的內容構成、發展過程，或其中語音系統等。

本文則擬以微觀角度與口述脈絡分析通事教材《養兒子》與《小孩兒》，因二者聚焦通事教育，彼此亦有相類之用語或段落，且不同於其他唐通事教材或專注於口語練習或記述通商史實等內容。《養兒子》與《小孩兒》之敘事形式具有明顯的說書人色彩，亦即口述特徵，如《養兒子》有「看了這一本《養兒子》的話」的話語，而《小孩兒》全篇為說話人聲音，主敘述議論，二者敘事有如話本小說中「入話」結構之聯結或擴大，具有明清話本小說甚至善書、類書或童蒙書的形式與內涵。因此，本文擬對照明清時期話本小說與善書、類書等書寫趨勢，嘗試分析《養兒子》與《小孩兒》此類書寫特徵與敘事結構，並探討此類寫作傾向與中國善書、童蒙書與明清話本小說形式特徵之相關內涵，以期由這些通俗文本形式的交流與影響理解當時中日兩國文學互動之一端。

## 一、常民知識的博物書寫

本文所據《養兒子》署名百癡道人半酣翁編集，約一萬字；書末署有安政四年丁巳（1857）年九月初四何伊代吉記周英藏書，而《小孩兒》則未有作者姓名，約五千字。署有何良英藏書。<sup>9</sup>二者皆屬唐通事的進階讀本，由敘事形式可見乃以閱讀訓練為取向，而非練習詞彙或會話的初級讀本。一如前述，唐通事教材從《二字話》、《三字話》始，其後進至《瓊浦佳話》、《譯家必備》、《醫生通話》等讀物，此等書籍並無版本，皆自己抄而習之。其中《養兒子》各段落之起結構擬白話小

話類纂考：他資料との関係から》，關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四号（2009），就《唐話類纂》各卷的二字至六字等語彙加以整理比較，凸顯其編纂特色，並見其於《唐話纂要》進至《唐音雅俗語類》、《唐譯便覽》、《唐話便用》的出版過程中之特色，紅粉芳惠，〈近代以前の日中語言學學習書から見る中国語教授法〉，關西大學《アジア文化交流》第四号（2009），聚焦特定時期中文與日文教材中相關二字話乃至四字話或成語語彙的編寫概念與教授方式，尤其著重特定語彙中的文法結構，其中雖提及《養兒子》，然僅提及此為通事自編教材，並無進一步分析。

<sup>9</sup> 本文所據之《養兒子》與《小孩兒》皆收錄於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下文引文出處不贅述。

說之連接方式，多以「正是」連結詩句或韻語以總結上文並引起下文，如「你們須讀聖人的書，孝順父母。一則唐話也會講，做得大通事，豐衣足食，揚祖顯宗，快活下半世，二則天地必然感應，有許多的福祥，子子孩孩，貴不斷了。正是：勸君猛省事親孝，天不容恕變做牛。」於述說不孝子的故事後，以俗諺作結，再次強調主張，全書以「正是」引起詩句再議論的格式，分為十段。全書並無主要情節，而是由說話人敘述各類事例所組成，有如話本小說「入話」結構之拼貼擴大。

而《小孩兒》之說話人則為學堂先生，文章開頭即云，「我和你說，你們大大小小，到我這里（按：應作裡）<sup>10</sup>來讀書」而文末則為「我這樣費心教訓你，你若不肯學好，正是叫做入寶山，空手回去的了，大家要緊要緊。」全篇約僅五千字，不分卷，亦無明顯段落，內容皆為教師對學生之訓話警惕，也集中對通事子弟為學做人及成為通事應有學養之講求。

《養兒子》與《小孩兒》有其類似性，分別以不同的角度記錄了對通事養成訓練的要求，《養兒子》提出勤勉孝順尤須苦讀等倫理要求，分別由父母子女等立場加以勸說，並指出父母之溺愛與後果，而《小孩兒》則具體描述學子怠惰無禮，不認真求學修身的種種言行舉止，不厭其煩一一細述告誡，並提出賞罰原則，以教師角度提出對通事養成的期許，二書之內容皆集中於通事學行之要求，具有明顯的白話口語傾向，並有同聲假借或形似字、訛字，以及使用中國南方俗諺等特徵。與明清之際的若干話本小說相較，《養兒子》與《小孩兒》展現了話本小說說話人口語敘述的形式特徵，尤其強化博物知識等書寫，可見其做為通事教本的教育目的，如《小孩兒》往往不厭說明比喻，以呈現特定事物之眾多形象與區別，其文云：

原來說話，也有恭敬人家的，也有輕賤人家的。大稱呼，小稱呼，都有分曉。遇著老人家，當稱某老；遇著年長的人，當稱某兄，你若尊重人家，人家也來尊重你。得罪人家，人家也來得罪你，這個應當之理了。還有進

<sup>10</sup> 教材中屢見同音字或錯別字，括弧內文字由筆者所改，下文同，不贅述。

退的話，也有忌諱的話，這個也要曉得。我看你們的說話，竟不分貴賤，蠻七蠻八，粗糙得緊，大的對小的講也不是了，小的對大的講也不是了，沒有一句中聽的開口，動不動講下賤的話，戲弄人家，不說叫化子，便說獸物事、強東西、蠹物事、活作怪、活強盜、狗奴才、捏狗屁、吃糞的飯袋、眇一目、跛一足、鵝鴨腳、瞎眼的、耳聾的、駝背、龜胸、歪嘴、雞蒙眼、斜眼睛、麻臉孔、疙瘩臉、冬瓜臉、西瓜臉、瓜子臉，說得這許多骯髒髒髒的蠻話，聽也不好聽。

藉由老師指出學生過失，列舉嘲笑他人外貌五官或智慧等種種話語，可見形容文字之多重精細，亦見語言學習之趨於進階，已非單字辭彙。其中也多用譬喻，詳細說理，其文云：

我看你上樓，踉踉蹌蹌，飛一般走上来，那梯子的板豁刺刺響，若是板梯稀薄的時節，只怕踏破了，踏得粉碎的哩，一下到樓上，坐也不坐，戲顛顛走來走去，反背著手，在那里（按：應作裡）野頭野腦，一些規矩也沒有的了。看你坐法，又不是端正，東倒西歪，或者靠著壁子，或著靠著桌子，不是伸腳，就是探頭，弄手勢，打鶴喧，打瞌睡，掀鼻涕，吐痰唾，捉虱子，取耳朵，多嘴的多嘴，放屁的放屁，弄手弄腳，無所不至，沒有一刻坐得端正，你說好個讀書人的樣子麼。

依我看來，你們是算不得正真的薄臉皮，又不是老實的，為何呢？唐話、日本話都講得一樣，那個就算天生臉皮薄的了。在我背後講日本話的時節，鬼話連天，只管多嘴。一日到晚總是不住口，臉皮鐵也似厚，若說起唐話來，不但是臉皮薄，像個耳聾口啞一般，口都閉住在那里（按：應作裡），一個臉孔裝做兩樣，豈不是裝鬼麼。

對於學生魯莽不端的言行觀察入微，相關的動作舉止如「飛一般」、「戲顛顛」、「東倒西歪」之描繪亦具體細微，如教訓學生走路莽撞，有踩破樓梯的可能，指

責學生瞌睡、吐痰、探頭、搔耳、多嘴等淘氣言行，遇到說唐話時就「耳聾口啞」，講母語日本話時就「鬼話連天」，各式譬喻鮮明，使文字具有動態畫面，說話人聲口亦因此明顯。

《養兒子》內容亦呈現通事教育的相關時代風貌，也呈現了庶民常識與思考，其文云：

天開地闢，山川水河，滄海陸地，林野城市，鳥獸蟲魚，萬物生焉。其中龍有神變，虎有勇猛。鶴有仙鶴，龜有神龜。雞報曉，狗禦賊，各有能所。聖人出世，鳳凰來儀，四海波靜，黔首安堵。居家養身，奉膳父母。生男育女，依靠後世。養子不教，何異禽獸，非其所宜。人者，萬物之中，最為靈者，造化之首，三才之一。

聖經賢傳，諸子百家，名儒書籍，博覽飽學，添才益智，舉家興業，深懷孝道，遠慮後代，仰視聖賢，俯察仁慈，教誨愚人，去邪歸正，則天感地憐，百福來降。這樣的時候，生出來的兒女，各各（按：應作個個）端嚴，孝第（按：應作悌）忠信，溫良貞節，世世代代，簪纓永接。良姻斯臻，恭儉惜福，子孫蕃盛，正是人生一世之榮，當時之富，名聞于後，德仰于今。

強調人與天地並稱三才，自應勤學修己，孝悌忠信，以求顯於當世，並聞名後世，既以此基調衍伸至家長須督促子弟學習之重要，從教材角度言，亦符合博物認知的需求。而此類書寫現象不僅有話本小說之口述特質，更呈現了如《千字文》或《昔時賢文》等童蒙類書之書寫風格。其後又云：

養兒子，有許多講究在裡頭，養了樹木花草，也是一樣道理。譬如松樹、梅樹、楊柳樹，梅花、菊花、水仙花、桃花、李花、櫻桃花、杏花、牡丹、芍藥花、酴醿、薔薇、蝴蝶花，鳳仙、雞冠、牽牛花，荷花、蓮花、雁來紅、水紅花、六月雪，桂花、石榴、蜀葵花，繡球、海棠、雪下紅，蘭花、

菖蒲、金燈籠、山茶花、芙蓉花，不論甚麼花木草卉，或者木本、草本、藤本從小養大，平常不去看他，或者倒歪在旁邊，或者枝幹枯死，一到開花的時節，沒有甚麼好看，所以日常間著意小心，培植得好，剪長護短，彎彎曲曲，養活得大了，那時開了好花，花瓣也大。千葉的、單葉的、白色的、紅色的、淡紅的、綠色的、黃色、寶藍色、紫色、淡黃、深淺綠、鴛鴦、間紅間白，花花綠綠，十分好看。……養兒子也是這個道理一樣的，等我慢慢裡分說起。

以養花蒔草比喻養兒子須細心照養，「剪長護短」，不能片刻鬆懈，文中不厭其煩，列舉大量花卉名稱、植物屬性、顏色種類，具有明顯的博物敘事。又如提及和尚之刻苦時亦云：

你看和尚也要辛苦，撞鐘擂鼓，念經坐香，口裡吃的東西也沒有太牢的滋味，寡是素菜，豆腐、麵筋、鬼豆腐、白蘿蔔，黃蘿蔔、芥菜、青菜、白菜，諸葛菜、蔥菜、韭菜、蒜頭、松菇、香菇、木耳、竹筍、香瓜、甜瓜、黃瓜、菜瓜、苦瓜、絲瓜、西瓜、南瓜、羊眼豆、刀豆、蠶豆、長竿豆、白篇（按：應作扁）豆、茄子、芋艿、山茹、茨菰、荸薺、蓮根、豆芽、菜豆、腐皮，這樣東西，或炒或燒，收拾起來吃，比魚肉的味道還差得遠，這個也是佛家的禁戒，不得不依他。他那一天講經講到三界火宅，火是嗔恚之火，戒示大家不可發惱。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要是忍著惱，不要使性。有一個光棍的不慌不忙走過來，把和尚的鐵鉢隨力氣丟在石板上打破了，打得粉碎。這和尚住了講經，發話大惱，說得那光棍笑嘻嘻對和尚說道：「師父剛纔勸我們不要發惱，說得坐不還冷，倒是自己會惱起來。」說得和尚無言可答，默默而退。可笑可笑。

這段文字乃是說話人「說一個笑話，散散悶」的內容，列舉各式素菜蔬果，敘述佛家禁戒，僧人飲食之疏淡無味，既有博物教學傾向，也隱然呈現說話人嘲

諷之意。

《養兒子》與《小孩兒》大量列舉日常生活事物與常民知識，以及正反相對的事例，不厭其煩地大量徵引山川地理、草木蟲魚，乃至酒食蔬果等各式日常生活事物，並熱衷議論世俗人情，敘述層面擴及生活經驗或人情世故，無論是句勢或內容，皆與話本小說之說話人語氣相類。<sup>11</sup>另一方面，也如同中國童蒙訓諭與言行規範書之教導語氣，具有中國宋元以來普遍傳播的民間日用類書或童蒙書之通俗色彩，而這些內容也符合唐通事對中國語言、價值文化乃至庶民信仰、日用技藝等訓練方向。<sup>12</sup>通事教材此類以白話描述姿態動作的書寫現象，即將姿勢言語加以翻寫，形成了附加說明式文字，展現了口齒清楚、口才流利等條件，可見通事的學習與養成所側重面向，也呈現了口語化之教育傾向。比較前此的通事教材如《唐話纂要》等，方向顯然不同，即於二字話、三字話乃至成語俗語等學習基礎上，再結合為完整文章，為由單字語彙進至博物書寫、全面議論的教材面貌。

## 二、通事學養的議論對話

口述議論為《養兒子》與《小孩兒》的主要結構，於內容中不僅呈現通事養成的期待，也因此呼應通事實際的教學需要，並分別以正反事例加以說明，運用大量議論文字，《養兒子》之叨叨絮絮的口語形式，明顯存在著類似說書人之形式類似。屢見「再說」「且說」或「說話的」「閒話少說」等套語，更強化「說話」

<sup>11</sup> 類似的博物書寫如清代酌元亭主人之話本小說《照世杯》卷四〈掘新坑慳鬼成財主〉之入話云：「只是氣也有秉得不同，用氣也有如法不如法。若秉了壯氣、秀氣、才氣、和氣、直氣、道學氣、意氣、清氣、便是天地間正氣；若秉了暴氣、殺氣、癲狂氣、淫氣、慳吝氣、濁氣、俗氣、小家氣，便是天地間偏氣。用得如法，正氣就是善氣；用得不如法，偏氣就是惡氣」，亦是不厭其煩大量列舉的敘事模式。

<sup>12</sup> 中國傳統啟蒙書有《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等，這些宋元以降普遍流傳且傳入日本的訓蒙之書或三言或四言，均以韻文出之，以利記誦，內容不外是宇宙自然、為學為政、百家姓氏、日用祭祀、農耕戰事、飲食園藝、歷史典故與道德觀念、人生哲理等，無論是句型或內容，皆與通事教材之形式有所相關。有關《千字文》、《三字經》與《百家姓》之成書、道德教育取向與傳播流行，可見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學生書局，2007）〈第三章識字與雜用〉，頁132-133，及梁其姿，〈《三字經》裡歷史時間的問題〉，收入黃應貴主編，《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頁34-36。

的表現。《養兒子》對通事訓練與學習態度，尤為強調重點，以為如此方能具備流利的唐話會話能力。其文云：

原來學唐話，言語很多，又有平上去入的四聲，開口呼、撮口呼，清音濁音，喉音齒音，牙音唇音舌音，半清半濁，都要分說。若不分明，糊糊塗塗的時節，指（按：應作只）當水裡放屁一般，唐人一句也聽不出。所以做通事的最艱難。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要學唐話的最要用心。不但是唐話，要學什麼事情，總要用心。學彈弦子也要用心，不肯認真的時候，便學十年，也學不成。那弦子響是響，沒有清亮。講唐話也是一樣的，字音分不清，憑你怎樣高聲講，也聽不出的了。這個叫做「如鴨聽雷」，摸不著頭路，竟是呆木了。若是生成牛笨的，學了一年半載，認真的時節，聰明是自然逼出來，那時候，肚裡明白，要講甚麼事情，就是講日本話一樣，容易講得來。

目今後生人家都不肯學，一到管中見了唐人，講也講不來，聽也聽不出，東也不成西也不成，也不怕羞，自己只說是好好的通事老爹，穿領長衣，插把好刀，裝個模樣，虛度光陰。每日吃了酒，吃得大醉，滿口講大話，說道：「我有本事」。罵了唐人。連唐人也講不透我的話，極口賣弄，自己只是有名無實，正真可笑可笑。

提及通事所學之唐話內容，指出唐話四聲與清濁合撮等特質，以為發音與響亮應精確，以免讓人「如鴨聽雷」，展現了當時學習唐話的情境與內容。同時強調學習尤須用心，勤能補拙，以求講唐話能像講日本話一樣自然，最忌求學不精，吹噓賣弄。《小孩兒》亦有類似的記錄，其文云：

你若依我的教法，平上去入的四聲，開口呼，撮口呼，唇音、舌音、齒音、喉音、清音、濁音，半清半濁，這等的字韻分得明白後，其間打起唐話來，憑你對什麼人講，也通得了。蘇州、寧波、杭州、揚州、紹興、雲南、浙

江、湖州這等外江人是不消說，對那福建人漳州人講，也是相通的了。他們都曉得外江說話，況且我教導你的是官話，官話是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的，若是打起鄉談來，這個我也聽不出，那個怪我不得。我不是生在唐山，又不是生成的，那個土語，各處各處不同，杭州是杭州的鄉談、蘇州是蘇州的土語，這個事你們不曉得也過得橋，我替你說。講一個唐話，先不先要個臉皮，臉皮不厚的時節，就打不來。

二者之敘述，顯然以日本人學唐話為發言立場，除了強調為學須腳踏實地，勤勉用心外，由語言俗諺等運用以強調學習唐話當勇於開口，並指出所學為天下通用之官話，而非中國南方外江各地方言，由此也得見當時通事學習的唐話內容，以及與中國南方各地的相關互動與影響，展現某種程度的通商時代氣息。

至於其他議論內容，則是具體敘述養育子女之細節過程，闡述教育子女與通事養成的重要，如列舉父母養兒相關的故事或傳聞，以及學子求學之勤惰、言行舉止之優劣，彼此相互對照，要求既生養亦須教育，關注為人父母所應具有的教養觀點與職責，其文云：

養兒子也是這個道理一樣的，等我慢慢裡分說起。當初生下一個孩兒，軟綿綿的衣服把他穿，把他吃乳，補了襁褓，尿撒撒屎。後來漸漸大了，把他吃些稀飯，纔得走動，講得幾句話，方纔把飯。過了五六歲七八歲，教他學堂裡去，教字又教他讀書，知他仁義理智信，五常的道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的解說，都叫（按：應作教）導他。這些道理都在肚裡明白。後來，一十五六七歲到二十七八歲上，十年之間，死心踏（按：應作蹋）地認真苦讀的時節，憑你甚麼樣愚蠢的兒子，也是一個博覽飽學的大才子，光耀門楣，多少好看，就是養了樹木養得好，開了好花，心裡歡喜。

那老子這樣教導他的時節，怎麼做得好通事，到底學個不長俊（按：應作進），做了不通老爹。見了唐人，像個泥塑木雕的菩薩一樣在那里（按：應

作裡），那心裡突突地跳起來，坐又坐不起，看了一個空，走開去。一年半載還可以農（按：應作矇）得過去。一兩年之後，唐人也托他通話，日本人也問他怎麼樣，那時候，講又講不來，聽也聽不出，滿面通紅，紅了又白，白了又紅，心裡老大埋然（按：應作怨）父母，說道：「我後生時候，父母不教我讀書，學唐話，所以這樣當官出醜。看這個光景，如何做得通事。我決意不要做職事，要告退。」

那父母看見到這個田地，心裡過不去，千方百計勸他兒子，那兒子主意已定，勸他不轉，那時後方才懊悔，早知這樣事，悔不慎當初。沒奈何，過繼別人的兒子，他那愛惜的親生兒子，退了職事，做個滄浪之客，弄得後來，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游手游賈過了日子，靠著父母吃死飯，這個不是兒子不成器，原來父母養得不是了。正在該學的時候，不叫他學，到把家裡的小事來照管，把正經的家業丟在腦後，不放在心上。……這樣沒本事的人，往往有個害兒子的，正是：「養子不教父之過，教而不嚴師之惰」。

強調養兒不教的後果，不僅兒子游手好閒不成器，身為父母也失去依靠，而這正是溺愛所造成的，其中的學習要求集中在通事養成，包括讀書寫字、充實知識，以及學習唐話、訓練口才，另外亦須學習算術等實用技能，其文云：

原來通事的兒子，讀書寫字，學講唐話，這個家常茶飯，不足為奇。還要生意上的道理也要通的，打算盤、秤銀子，天平法馬，大秤小秤，秤駝秤錘，秤架秤馬，頭紐二紐等子，輕重多寡，吃虧賺錢，這些道理。都要明白。又要做詩、又要做文章，不論甚麼書，看得明白，肚裡大通，方纔做得大通事。

此段提及通事家之父母不可溺愛其子，務須督促兒子讀書學習，以及打算盤、秤銀兩等多方的實務學習，以求成為能文能詩、能講流利唐話的稱職通事，<sup>13</sup>既呈

<sup>13</sup> 據《瓊浦佳話》卷三與卷四所記，通事除了翻譯，亦須執行唐船之清貨工作以確定是否有走私等

現「通事的兒子，讀書寫字，學講唐話，這個家常茶飯」的通事世襲之背景，並敘述親生兒子退了通事一職，游手好閒，只好過繼別人之子之例，以強化其「養子不教父之過，教而不嚴師之惰」的主張，於此也呈現了對中國道德價值之認識與遵循。而《小孩兒》則以另一角度強調認真為學之重要，其文云：

我想來想去，想出一個論頭來。大家這樣撒潑，究竟學不成了，素新（按：應作索性）把你不要讀書，替父母商量，教你學做生意。但是說莫說，做生意也不是個容易做的，先不先做人停當，會寫字會算盤，十分能幹的，才會得去賺錢。你若不在行，痴痴獃獃，一竅不通的，就是手頭有了兩分本錢，都被人家騙了去。

其中強調為學態度的重要，無論讀書或做生意，皆須穩重認真。此乃於《養兒子》所指稱的通事須會讀書、作詩寫文章等多元面向外另有主張，若不勤勉穩重，即使會寫字打算盤，仍是「痴痴獃獃」，一事無成。此類主張通事學養之文字明顯有議論之跡，既有說話人亦有看官之存在，又如：

閒話少說，為什麼緣故，油嘴放屁的。只管說養兒子的話。在下要說通事家的兒子，養得不好，沒主意的只顧嬌養，不見一些仁慈的道理。可惜各家的令郎，擔了個讀書的虛名，沒有幾個會講話。有胆量的，只管東走西蕩，不去務本，錯過了青年，多是學成了不痛不痒的人。俗語說：「桑條從小變，長大變不曲」，那兒子年少無智，不曉得是東是西，書是不要讀的，那裡曉得甚麼道理。只要做父母的，著意小心，從小養大，學得成器，則纔見得慈心。

說話人不僅發言，也刻意以「閒話少說，為什麼緣故，油嘴放屁的。只管說養兒子的話」呈現聽眾與說書人對話模式，進而發表其主張。類似書寫現象如：

---

情事，且就唐船所載來交易之商品，負責與唐人講價。

說話的，為什麼緣故，絮絮叨叨，只管說養兒子的話。只為著愚頑小兒要學成的意思。雖然如此，自古道：「狗兒不生虎」，原來狗種變不得虎也。也說，便是這等說，也是拿不定的說話。瞽叟生大舜，聖人賢人的子孫，也有桀紂之王。由此看起來，虎生狗是容易的，狗生虎是篩眼裡隔出來的一般，十分難得。

俗語說：「誰家父母不惜子，那家公婆不惜孫」。一片憐惜的念頭是免不得的，眼下甜言蜜語，愛惜兒孫，終究是以毒愛兒子。常言道：「小人之言，甜如蜂蜜；君子之言，利如荊棘。」不在（按：應作才）的說話，各位後生家都不喜歡一看，看了這一本《養兒子》的話，各各（按：應作個個）都悶殺了，就丟開去。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不知不覺又說起來了。這些拘縮（按：應作拘束）的說話且擋起來不要說，如今說一個笑話，散散悶何如？

於此，說話人不僅使用「以毒愛兒子」、「小人之言，甜如蜂蜜；君子之言，利如荊棘」、「虎生狗是容易的，狗生虎是篩眼裡隔出來的一般，十分難得」等俗諺或譬喻，也以「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看了這一本《養兒子》的話，各各（按：應作個個）都悶殺了」加以自嘲，說話之跡甚明。另外的文字也點明看官的存在，並顧慮說話若過於牽枝帶葉，惟恐引起反感，其文云：

前說不長俊（按：應作進）的話，講也講得多了。也有講不到的所在也很多，若是再要牽枝帶葉，說得話長，倒為厭氣。不過數落一攤，說得大概而已。這一回要說兒子好的意思，暢說一番。看官們聽著，古人說，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我們通事家的兒子，學，則底下的人也高身做大通事，不學的時候，大通事兒子不得高身。所以養兒子須要指望學成器，做父母得先要辛苦，為什麼緣故呢？

不僅提醒看官們注意，也再次使用「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人」諺語，又有「我們通事家的兒子」之話語，使說話特徵更見明顯。

至於《小孩兒》則全篇由說話人聲口構成，議論之跡相當明顯，即意識到學生的存在，言談中屢見你或你們的指稱，具體呈現教導情境，全篇爲日本學堂教師訓誠學童之口吻，即作者直接陳述，不隱藏自己，而非藉由故事人物發言而試圖使讀者相信是其他人在說話，全篇皆爲通事教師的獨白，但話語中顯然意識到聽眾及學生的存在，而多以「你」或「你們」指稱，以敘述相關的求學規矩與期許，其文云：

我和你們說，你們大大小小，到我這里（按：應作裡）來讀書，先不先有三件不是的事情，等我分說一番把你道。你們須要牢牢記在肚裏，不要忘記。原來人家幼年間到學堂讀書，不是學人不正經，要是學好的意思了。

文章開頭即確立「我」的發言立場與「你們」對話關係，即老師對學生之訓勉規勸，而發言內容自是以爲學做人宜勤懇認真爲中心，對於正反行爲與看法，皆有詳細陳述，其文云：

你既不成器，我的意思，寧可把大家一個一個趕出去，以後不要來讀書，但是教導了一年半載，讀過幾本書，算做我的學生了。不論正經不正經，學生的名分是都有的。若不把好言好語勸化你的時節，倒說我沒情。

我是你的先生，既做了先生，不得不嚴。我的做人雖沒有甚麼穩當的事情，平常不曾哄誘你做個不好事情，肚裏雖沒有甚麼大通的，筆也搦得出。我說的唐話，雖不如唐人的口氣，不過杜謾撰而已，但是不是講假話，又不是大夢話一樣，不三不四的，算做一個唐話，可以作得准了。

強調老師對自我與學生之期許，並說明「既做了先生，不得不嚴」的道理，而先生之說話，一如話本小說之說話人，針對特定事理予以宣揚闡明。其中的議

論文字亦具有明顯的說話傾向，其文云：

做一個人家，要曉得知恩報恩這四個字。你既做了我的學生，要曉得我的恩。我的恩在那里（按：應作裡）呢？一個朦朧懂懂（按：應作懵懵懂懂）、一字不識的，千辛萬苦指點你，方纔字也識得出，書也念得下，後來肚裏大通，做了職事。一年收多少俸祿，又不少吃、又不少穿，快快活活過日子，究起這個根本來，都虧我好幾年用心教導你教導上來的。只當置了幾所良田美產送把你一生受用的一般了。既受這樣大恩，若不曉得報，竟是土木了。

據我這樣說，像個貪圖你的報恩，故意說法，要你報恩一樣，覺得粗俗。但是我的心裏不比別人，原不要你報恩，又不要你不報恩，有一種道理。報恩也有幾等幾樣，譬如看見恩人手頭貧窮，送米糧送柴火送銀子周濟他；或者替他計較，尋個門路，抬舉他，做職事也有，救命的也有，救病的也有，鳥獸也曉得這種道哩（按：應作理），麻雀是含環報恩，烏鵲是反哺報恩，這等的故事還有許多，說也說不盡了。

我不是貪圖甚麼這樣的便宜，明日縱或我家遭瘟，當敗了家私，沒得飯吃，也不要你們送口糧，我若造化不好，一生一世沒有前程，也不要你們方便，又不消奉承我，又不消疼熱我，冷阿（按：應作呀）暖阿（按：應作呀）都不要你費心，只有一件事情依我的說話，那個就在我身上算得大大報恩了。你道什麼事情呢？一來守規矩，做人要正經；二來發狠讀書，當心學話，你若做人忠厚，不學不長俊（按：應作進），肚裏大通，唐話也會講，明日出頭的時節，不但你一個人體面好，連我的名聲也惹得大起來了。

學堂教師反覆陳述期許學生應知恩報恩但「不消疼熱我」，以強調並非希冀學生報答自己的心態，而是希望學生端莊守規矩「做人忠厚」，認真學唐話，「肚裏大通，唐話也會講」就是報大恩了。長篇大論中尤見說話人聲口，如「你既做了我的學生，要曉得我的恩」「我不是貪圖甚麼這樣的便宜」等發言之跡明顯。

《養兒子》與《小孩兒》議論說理的特徵類似中國白話小說的形式結構，其議論人情事理而非虛構描繪故事情節的敘事方式，可視為入話結構之擴大，並符應話本小說的某些發展趨勢。《養兒子》、《小孩兒》強調議論、不厭徵引等現象更符應了《通天樂》、《雨花香》等話本小說散文化的敘事趨勢，這些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因寫作關注焦點之改變，往往使敘事傾向議論或勸善，創作目的重在教化，而忽略情節鋪陳。<sup>14</sup>

事實上，明末清初艾衲居士《豆棚閒話》與石成金《雨花香》、《通天樂》等話本小說的敘事趨勢與既有的話本小說書寫特徵已有所背離，敘事取向不像前此的《三言》或《二拍》所主張的「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不害於風化，不謬於聖賢，不戾於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即於道德關懷之同時仍著墨故事情節之經營，而是主議論重紀實，篇幅普遍不長，不僅於作品中不斷強調記事之真實性，更強到其中的道德講究，將具體事例結合大量議論，甚至結合因果報應等觀念以強化事件之可信度與說服力，且多以白話記錄了作者的學識素養與人生批判，包括對史實、宗教或思想的各式評斷，可視為是隱蔽於俗文學形式的雅文化風格，以小說形式表現作者的學術理論與品鑑，而非文學的構思經營，即專主勸誠，本此意為書，未專注於情節鋪陳，自成一體。<sup>15</sup>

### 三、承襲新創的通俗脈絡

由於時代因素與文學交流，唐通事教材之編寫往往是教育取向與通俗脈絡之相融互動，其中顯然有明清話本小說之影響。江戶時期由長崎傳入日本的中國白話小說之所以不斷增加，固然是中國當時熱衷此類創作，亦有若干作品屢遭清廷

<sup>14</sup> 張永歲，〈論明末清初擬話本的非文體化現象：以《豆棚閒話》為個案〉，《湖南大學學報》21卷3期（2007），頁93-94。

<sup>15</sup>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分類說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云，「清以來有專主勸誠之作，與傳奇用意似相近而又不盡同。且藉小說以醒世誘俗，明善惡有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則凡中國舊日小說，亦莫不自訖托此，然皆以此自飾，從無自始至終本此意為書者，則清之勸戒小說乃自成一體，為古昔所無」。

查禁之故，另一方面則是日本學習唐話的盛行。<sup>16</sup>當時，明清白話小說不僅成爲唐通事之教材，也對其後自創的唐通事教材之敘事特徵與結構產生了影響，如江戶中期儒者岡島冠山（1674--1728）不僅編譯《忠義水滸傳》做爲唐話教材，同時於其唐話教材《唐話纂要》卷六〈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兩篇之語言與行文類似說書人講故事，其中亦有以詩句輔助情節發展進行等白話文學之形式特徵。<sup>17</sup>

〈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尙有經營故事情節之意識，至《養兒子》與《小孩兒》等通事教材則已忽略情節安排之構思，而是根據當代相關人事加以記錄直書，書寫方向雖異，議論說理的特徵則類似中國白話小說的形式結構，議論人事而非虛構人物情節的敘事方式尤其與《通天樂》、《雨花香》<sup>18</sup>等夾敘夾議、重記事而不重情節安排等話本小說類似，如《雨花香》自序即云，「乃將吾揚近時之事實，漫以通俗俚語，記錄若干，悉眼前報應，須知警醒，明通要法，印傳寰宇」，基於風教勸懲之目的，作者自覺以記錄筆法出之，《養兒子》的敘事也是記錄眼前真實具體事物，此種表現顯然有通事教材的考量，僅簡約敘述故事，不注重情節之虛構或經營，亦即敘事重點在於宣揚主張並說服讀者，而《小孩兒》則爲日本學堂先生訓誡學生的內容，自有其現實性，尤其展現了敘述與議論的教學傾向。<sup>19</sup>二者的敘事特徵亦有如《豆棚閒話》<sup>20</sup>中的長篇議論與對話，往往省略情

<sup>16</sup> 據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頁 50，引述《御文庫目錄》中，從寛永（1624-1644）至寛文（1661-1673）初年的三十多年間載錄的白話小說約有十九部。又唐本目錄和舶載書目則記載，享保十二年（1727）進口中國小說十四部，其中多講史類，寛保元年（1741）進口中國小說十二部，寶曆四年（1754）九號船載來中國小說三十部，並引述大庭脩，《江戶時代唐船攜來書研究》，以為其中所收的商船載來書目，《醒世恒言》於享保十二年（1727）、《今古奇觀》於享保十六年（1731）、《警世通言》於寛保三年（1743）年從長崎進口。至天明四年（1784）序、寛政三年（1791）出版的《小說字匯》中援引書目所列的書名達一百六十部之多。

<sup>17</sup> 岡島冠山，《唐話纂要》，享保三年（1721）江府日本橋出雲和泉櫻本。

<sup>18</sup> 《雨花香》、《通天樂》合刻本。編者石成金，生於清順治末，約卒於雍正十年，約介於 1660-1736 年間，揚州人，書中內容皆為明末清初的揚州故事，旨在明因果、主勸懲，多記事而非虛構人事情節。

<sup>19</sup> 馮夢龍、凌濛初編寫《三言》與《二拍》雖強調教化的要求，但也意識到文章虛構藝術之必要性，所謂「事真而理不虧，即事虧而理亦真」，是以敘事中有描繪有刻畫，尤其注重文章結構，及至石成金之《通天樂》《雨花香》，則強調教化至上，以至忽略敘事藝術。《養兒子》與《小孩兒》

節描繪或渲染，而增加議論文字，強化相關的主張與勸化重點，而非故事之經營曲折。

於此，小說中的議論篇幅大於描述文字，多見作者感慨而非情節發展或人物刻畫。作者以散文且筆記體的方式表達相關意見或主張，並將歷史傳說、山川地理、風土民情、知識典故等融合為一，淡化了話本小說原有的強調敘事曲折的形式特徵。於敘事結構上，點明編撰目的，多以議論文字說明主旨，再講述故事，故事專為主旨而設，至篇末又再次強調勸懲。<sup>21</sup>話本小說朝向散文化或議論化的傾向發展<sup>22</sup>，唐通事教材則吸收此類白話敘事模式的發展變化以符合其教學需求，於時代因素與文學交流的背景之下，沿襲模擬，另加整合，至《養兒子》與《小孩兒》等通事教材則擇取運用此發展趨勢。由明清話本小說敘事的發展趨勢與寫作

---

成書時間未定，但對照同類通事教材《瓊浦佳話》，其成書年代據石田義光，〈小說瓊浦佳話解題〉，東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報告》第一號，1968，頁22-33，以為應為1718年左右，另一方面，據いしるのぞむ，〈大浦天主堂藏唐文禁教榜辨釋〉，發表於第三回長崎純心比較文化學會，2009年5月16日，頁28，則《瓊浦佳話》中唐人稱頌康熙十四皇子胤禎討伐韃子有功，而胤禎為雍正政敵，並曾遭其軟禁，至1735年雍正駕崩方得平反，是以唐人之稱頌胤禎似不合時局，故《瓊浦佳話》之成書年代亦有可能為1735年雍正駕崩之後。基本上，《養兒子》與《小孩兒》之成書應同屬此一時代，最早亦不早於十八世紀，雖無法明確斷定是否直接受到明末清初成書的《雨花香》或《通天樂》的影響，但由文本形式判斷，至少可視為特定時代不同空間之文本模式流通或符應之現象。

<sup>20</sup> 艾衲居士編，《豆棚閒話》康熙寫刻本，作者真實姓名不詳，共十二卷，每卷各有一人說故事，彼此不相連屬，以豆棚做為談論空間，以為敘事結構予以串連各篇故事。

<sup>21</sup> 戴健，〈試論雨花香與通天樂的勸善思想〉，《揚州大學學報》10卷6期（2006.11），頁38-39。

<sup>22</sup> 除了話本小說的議論化與散文化趨勢發展外，白話文學中常穿插的韻文段落也有發展變化，如魯德才，《古代白話小說型態發展史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第六章《水滸全傳》與七十一回本《水滸傳》的敘事型態〉，頁120，以為話本小說的形式特徵具有說話活動的背景，於書面的寫作中，由說話人變化的作者角色，往往藉說話活動的主要成分即韻文發揮其他層次之陳述評論，並期交流。說話人可以藉此以提示、設問、重述、詮釋等，縮短了與聽眾的距離。又徐德明，〈中國白話小說中詩詞贊賦的蛻變和語言轉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6期（2008.2），頁51，則提及韻文與散文融合所形成的文體差異，以為從書臺勾欄上的說話到書面小說文本的定型中保留了大量韻文，因此建構出一套適應聽眾接受的敘事模式，說書人控制所有敘述過程，藉各式間雜文本段落中的詩詞歌賦等時時調整敘事路線，與讀者之距離亦時有變化。然而，書面化的趨勢往往影響韻文之發展，而漸趨僵化定型，說書人介入的書寫形式卻也往往形成敘事的干擾或閱讀的阻礙，終而形成另一種敘事模式的反省與調整。原本生動具有臨場反應的韻文表現被固定於書面文字中，文人介入小說的創作、文本的印刷流傳使說話藝術漸趨僵化，富有表意性的聲音動作因而消失。

傾向可見，小說形式至此不過是用以詮釋特定價值的媒介，《養兒子》、《小孩兒》也有如此的敘事傾向與期待，此固然有明清話本小說的敘事觀點改變趨勢之因素，但其勸說議論的形式也受到明清善書之勸善特徵所影響，同時也吸收其中呈現的價值期待，成為通事學識人格養成之準則。

《養兒子》與《小孩兒》不僅議論形式與話本小說之類似，事實上所主張的道德倫理之內涵，亦來自中國傳統價值，如顯現忠孝勤學等通俗勸善傾向，此一背景實可擴大追溯至中國日用類書、善書或童蒙書之影響，事實上，話本小說也與此類日用類書、善書等有所關涉。民間類書供大眾日常實用、道德教育，及文化娛樂之需要，而明清盛行的道德倫理文本善書，由於具有通俗善惡信念的色彩，通俗易懂、簡單易行，故傳播極廣，影響深遠，尤其至明代中葉以後，書坊熱衷刊刻的民間日用類書，雖有市場導向之背景<sup>23</sup>，但也成為大眾生活日用與初級教育之來源，對古代小說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和小說理論也產生影響，也與同在當時盛行的話本小說在書寫形式或價值內涵上多所融通，彼此影響。<sup>24</sup>如善書作者為求生動有趣，以產生更大的勸善效果，也借助了小說的藝術形式及寫作手法，二者相互滲透，界線因此模糊。<sup>25</sup>如《雨花香》與《通天樂》與石成金另一規勸世人

<sup>23</sup>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第一編總論〉，頁 91-92，及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上）（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第二節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的盛行〉，頁 35-36。

<sup>24</sup> 如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第一編總論〉，頁 28-31，以為，韻語知識讀物有兩大類：一為訓誡類，如兒童守則、格言諺語等；二為介紹掌故與各科知識，如《女論語》、《蒙求》等。通俗類書採用詩歌形式敘事，與通俗文學的敘事傳統有密切關係。民間類書與話本小說、戲曲之體制面貌、文化品格完全相通。

<sup>25</sup> 如小川陽一，〈明代小說與善書〉，《漢學研究》6 卷 1 期（1988），頁 331-340，以為自南宋初期出現《太上感應篇》以來，明清兩代有了大量善書，且普遍流行。尤其以《太上感應真經》、《關聖帝君覺世真經》、《文昌帝君陰騫文》等三種善書被稱為《三省篇》或《三聖經》，而特別受到尊重。這些善書盛行期正好也是中國小說的全盛期，二者應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響。而主要的影響有三層面，分別是小說中的故事人物看善書、勸人看善書或出版善書等情節，如《西湖二集》卷三十〈馬神仙騎龍昇天〉；小說引用善書語句，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與《石點頭》第七卷；小說中的某一部分或整體內容以善書思想做為題材或結構，如《西遊記》《紅樓夢》之命運觀以及《剪燈新新話》的〈三山福地志〉等。內容萬晴川，〈明清小說與善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 年 1 期（2009），所謂「善書」，是以因果報應的說教方式宣傳倫理道德、勸人從善去惡的通俗教化書籍，簡稱善書，民間又叫「勸世文」或「因果書」。宋代有對後世影響甚大的《太上感應篇》。金元時期則有無名氏的《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陰騫文》等。明清是

行善止惡的通俗善書《傳家寶》密切相關，<sup>26</sup>此種百姓日用之學可視為是傳統倫理的生活化、通俗化，書寫形式淺白易懂，宋代以來的善書傳統多以通俗的儒家觀念融合道家、佛教的觀念，做為大眾的道德意識和行為準則。於敘述方式上亦較平易活潑，多運用笑話或韻語等形式。而蘊含於這些通俗文本中的民間文化、價值系統乃至運用韻語的書寫體例，對明清話本小說產生影響，因而呈現特殊的時代精神和文化意義。其中具有明顯的勸善思想，此亦為傳統善書之價值關懷，相關的道德或人生觀由此不斷複製傳遞。

唐通事教材於形式與內容皆可見複製中國傳統價值之跡，除了沿襲善書與話本小說之書寫特質外，對於通事學養言行之要求，亦來自中國傳統價值觀點，由《養兒子》與《小孩兒》之引用內容可知，如前所述，二者引用如「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仁義理智信，五常的道理」、「瞽叟生大舜，聖人賢人的子孫，也有桀紂之王」、「狗兒不生虎」、「小人之言，甜如蜂蜜；君子之言，利如荆棘」或「桑條從小變，長大變不曲」、「含環報恩，烏鵲吐哺」、「小時偷針，大時偷銀」、「入寶山，空手回」等中國俗諺譬喻或文史故實。又如《小孩兒》提及學生懶惰撒野時，「還有大漢子，把曲本西廂這等的閒書藏在身邊，帶過來放在側邊，假做讀書，低低兒唱曲子，把一個學堂當作戲臺上」，尤其《養兒子》每則論述後皆有如「好酒出深巷，嚴父出孝子」、「十年受盡燈前苦，一舉成名天下聞」、「皆能有

---

善書的盛行期，不斷再版以前的善書，如《太上感應篇》就出現了眾多版本，李贊、高攀龍、陶望齡、袁黃、惠棟、俞樾等著名文人都曾為《太上感應篇》寫序或作注。其次則是善書之新作不斷推出。如佛教寶卷、功過格等勸善書廣為流行。所謂功過格，是將自己的言行予以善惡功過的分類，並為善惡評估打分，依此分數作為判定行為倫理價值的標準，並作為獲取禍福報應的根據。其中袁黃的《了凡四訓》對明清社會產生了相當影響。明清是善書和通俗小說發展的鼎盛時期，善書與通俗小說之間存在著雙向互動的關係。善書對通俗小說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和創作理論進行滲透；另一方面，善書的製作者為使善書通俗易懂，生動有趣，以產生更大的勸善效果，故又借助了通俗小說的藝術形式和寫作手法。

<sup>26</sup> 據戴健，〈試論雨花香與通天樂的勸善思想〉，頁 38，今見《雨花香》與《通天樂》篇目分別為四十篇與十二篇，二書本為石成金《傳家寶》之一部分，喻岳衡校訂《傳家寶》第三、四集分別收錄《雨花香》十三篇與《通天樂》二篇；揚州圖書館藏「民國歲次乙酉古滇孫氏影印」本分別收錄十九篇、兩篇；又據《古本小說集成》本《雨花香·通天樂》之黃毅〈前言〉可知，上海圖書館所藏《雨花香》刊本後附《通天樂》十二種，二書有合二為一之例。由此可證二書皆為《傳家寶》的組成部分，與單行本的不同只在篇目、卷次之出入。

養至犬馬，不敬何由以別乎」等共十句俗諺外，尤其如《養兒子》敘述勤學勤讀之故事，「再說古時的人勤學勤讀的話，講把你聽著。有一首詩道：『鑿壁引光對聖賢，囊螢照夜讀書遍。古人多有磨鐵土，今世誰堪雪裏天。』」歷數詩中之匡衡、車胤、李白、孫康等故實傳說，並另引江必、蘇秦之苦學成器之事，主要即強調「學，則祿在其中矣」之主張，同時也引述齊相晏子車夫之妻的故事以強調內助之賢等。

此類書寫現象具有話本小說之書寫特徵，也藉口語化的改寫將中國史部或子部之人事融入，使這些教材也具有文言典籍的背景，至於善書或類書的通俗倫理關懷則更是明顯，然一如前述，這些價值觀實來自儒家觀點的轉化。《養兒子》亦引用《陰鷙文》，以說明忠孝乃爲人之本，其文云：

《陰鷙文》說道，「諸惡莫作，眾善宜行」。惡於人者，天不容他，這個不必多講。眾善者不可細言，多得狠（按：應作很）。做了陰德，必有陽報，其中最要緊的是忠、孝兩樣。忠於主公，孝於父母，這兩樣是德之本，人之道也。

若是不孝於父母，不忠於主公，而做了陰鷙，修路補橋、賑濟窮人，都沒相干。為什麼緣故呢？不忠不孝的大惡在裡頭，憑怎麼樣修了陰德，哪里（按：應作裡）有什麼陽報。只管說陰功陰功，倒惹得不好來了。你若要陰鷙，先要孝行父母，做人忠厚，不然的時候，費心費力，又費了錢財，修了陰功，只當死人口裡灌了人參湯（按：應作湯）一樣，不但沒有效驗，空費了許多心機。常言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病在呼吸之間，吃了人參湯（按：應作湯），還可以效得活也沒憑處，一到脈氣斷了，便是烏有先生了。菩薩也是一樣，有緣自然濟度得來。緣是什麼道理，是善也。善者，忠孝為先，眾善從之。不忠不孝的人，隨喜燒香，許願心，菩薩背過臉來，屁也不放一個送來，這個該當的道理。佛在各人各人的心裡，不必他求。

我嘗看見目今通事家的令郎，各各（按：應作個個）都懶惰，不愛讀書，

這都是做父母的不要叫兒子學好，墮落、不忠不孝的意思。為什麼緣故呢？我們通事家全靠著筆墨堆裡糊得口，年紀十七八歲二十歲上下，正在該學的時候，哪裡得知。不在書房裡讀書，或者拜菩薩，或者走花街，在那里（按：應作裡）闖來闖去，每晚出門，錯過了青年。做父母的許他出門的時節，那里（按：應作裡）有工夫去學好？隨波逐流，只管學個不長俊（按：應作進）。這樣的時候，做父母的沒有一點慈悲的道理，學個成器。之後由他也罷了。

不僅呈現「我們通事家全靠著筆墨堆裡糊得口」的時代面貌，強調認真學習不可虛度光陰，也保留了「目今通事家的令郎，各各（按：應作個個）都懶惰，不愛讀書」「或者拜菩薩，或者走花街，在那里（按：應作裡）闖來闖去，每晚出門」等當代寫照。於此前前提下，《養兒子》闡述《陰鷙文》忠孝為本的觀點，<sup>27</sup>強調學識之外，也必須注重倫理修身，子弟務須忠孝，而非藉由積陰德陰功以求保佑，忠孝之人才能獲得保佑，享有福祿壽，子孫後代也將繁榮發達。如此的主張乃將學習與道德合而為一，不僅強調須務本求學，尤須注重人倫品性，另外，《小孩兒》中所強調的報恩之說，也符合《陰鷙文》中所強調的報答君親師之恩，由此可知，通事教材也吸收承襲善書之勸善思想，結合庶民的倫理觀念與人生價值期待。

除了價值內涵呈現善書之影響，《養兒子》與《小孩兒》所採取的說明議論

<sup>27</sup> 陳芷燁，〈明清社會勸善書及功過格的歷史作用及價值——以《太上感應篇》《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陰鷙文》為例〉，《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5期（2008），頁54-55，《文昌帝君陰鷙文》簡稱《陰鷙文》。約成於《太上感應篇》之後，至遲不會晚於元代。「陰鷙」源於《尚書洪範》：「惟天陰鷙下民」，意謂上天暗中保佑人們。在《陰鷙文》中，「陰鷙」是指只要人們多積陰德陰功，文昌帝君將會保佑並賜予福祿壽，使子孫後代繁榮發達。強調的內涵有家國同構的倫常關係，以忠孝為基本原點，遵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思路。其中「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報答四恩」，「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等，都和中國傳統道德重視家族倫常關係的特點一致。注重以三綱五常的原則處理家族中父子長幼等級關係，並推廣以處理君臣尊卑等級關係。作為官吏，應報答天地君親師的恩典，在家為孝，入朝盡忠等，皆是不能違背的根本道德信條。若能以此為人生準則，則福祿壽將降臨，科場得意，富貴榮華，兒孫滿堂，世代家道不衰。

特徵，也符應了善書與白話小說的庶民傾向，亦即對話的對象往往為庶民，因此於說理方式與價值傳輸上，也皆有平易淺白的趨勢，並強化勸化目的，此種寫作趨勢具有明顯的議論傾向與教育目的，也保存了時代風貌，針對通事此一特定的時代職務加以記錄書寫，不僅提出有關通事養成的口才學識的學習，並訴諸道德修身的關懷。

不同的是，明清此類話本小說宣揚教化、勸善懲惡的對象在大眾，而《養兒子》與《小孩兒》則是訴諸通事養成的教養內涵，有特定的教育對象，更無意於虛構情節之經營，而是記錄特定時代的史實風貌，其中特定的寫作形式，也不同於當時其他通事教材之編寫特徵，既有別於單純會話的教材編寫，也不同於通商史實之紀錄，而是進階的敘事與閱讀之編寫思考，《養兒子》與《小孩兒》的形式固然有話本小說的影響，然並非全然複製模擬，而是於中國的文史故實與文學特徵等基調上，加以融通，以口述為表現重點，教學內涵亦訴諸道德倫理，不限於單純的語言訓練，形成特殊的書寫風貌，既有白話小說之跡，但亦有其特殊傾向，且不同於其他通事教材之面貌，於通事教材的發展上有其意義，而此類敘事形式與內涵上的沿襲與融通，或可展現明清時期中日通商交流所形成的文學傳播與文化交流之痕跡與相關影響。

### 結語

唐通事教材記錄了十七至十八世紀中日通商的人事史料、風土民情，語彙口音等，也可見此類教材對中國文學與文化故實等傳承運用。通事養成的實務需要如口語訓練傾向與相關知識培養，使書寫特徵或有異同，相關教材往往呈現當代風貌，以及中日通商交流的史料，另一方面，此類教材也呈現特定時期的文學特徵與意義。

唐通事教材《養兒子》與《小孩兒》在書寫上具有說話人特徵與博物類書的屬性，其中列舉的通事教育與倫理教化等相關事例或傳聞，以及屢次徵引詩句與屢用俗語等現象，皆可見通事教材所強調的教學傾向，如認真苦學、學習流利口

才與修身道德等期許，其中承襲了話本小說「說話」或「話」的書寫特質，也就是強調通俗口語的能力訓練，如《養兒子》由十則與父母養兒相關的故事或傳聞構成，以「正是」引起對句做為各則故事之分別，文中列舉大量博物品項或常民知識，可見既是訓練流利口才，也期增加相關知識。而《小孩兒》則全篇為教師訓導學生之言，兩部教材皆以白話書寫，主議論，徵引詩句，多用俗語，皆集中於通事教育之語言與實務訓練、勤勉求學與孝順恭敬等學識言行之講究與通事家庭養兒與職業世襲等諸般現象。

《養兒子》與《小孩兒》的敘事模式可視為是話本小說「入話」之拼貼與擴大，《養兒子》具有明顯的說書人特徵，屢見「再說」「且說」或「說話的」閒話少說」等套語，更加強化「說話」的表現，而《小孩兒》則全篇為敘述者之聲音，其間多為通事教師的獨白，但話語中顯然意識到聽眾及學生的存在，而多以「你」或「你們」指稱，以敘述相關的求學規矩與期許。這類運用白話、詩句及說話人存在的敘述形式既有話本小說之結構特徵，其中的道德關懷也類似中國善書與類書之內涵，也就是取材尋常事跡，以平易白話甚或俚語俗話加以表現，意在勸世激勵。

話本小說與日用類書或善書之淵源，以及因之而生的散文化之敘事趨勢，往往使寫作關注焦點有所改變，使敘事傾向議論或勸善，創作目的重在教化，而忽略情節鋪陳。唐通事教材也擇取了此一敘事主軸，不同的是，明清此類話本小說朝向宣揚教化、勸善懲惡的方向，而唐通事教材則是多訴諸通事的教養功能，養成的內涵包括相關的學識與語言之訓練，以及倫理道德的灌輸。其中所具有的中國通俗價值脈絡乃至話本小說的敘事特徵，顯現了話本小說與善書類書彼此之影響與發展變遷，而唐通事教材本身亦另加吸收融通，其中書寫形式與價值內涵，亦提供中國話本小說傳播海外現象與相關影響發展之另一脈絡。

## 徵引文獻

### 一、通事教材

《小孩兒》，收於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

《養兒子》，收於六角恆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東京：不二出版社，1998。

### 二、專書

大庭脩，《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六角恆廣著，王順洪譯，《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學生書局，2007。

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

李樹果，《日本讀本小說與明清小說：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分類說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魯德才，《古代白話小說型態發展史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 三、期刊論文

小川陽一，〈明代小說與善書〉，《漢學研究》6卷1期，1988。

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卷5期，2007。

紅粉芳惠，〈近代以前の日中語言學學習書から見る中国語教授法〉，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第四号，2009。

許麗芳：日本江戶時期唐通事教材《養兒子》與《小孩兒》的口語特徵與倫理關懷

奧村佳代子，〈唐話類纂考：他資料との関係から〉，《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四号，2009。

徐德明，〈中國白話小說中詩詞贊賦的蛻變和語言轉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6期，2008。

張永歲，〈論明末清初擬話本的非文體化現象：以《豆棚閒話》為個案〉，《湖南大學學報》21卷3期，2007。

陳芷燁，〈明清社會勸善書及功過格的歷史作用及價值——以《太上感應篇》《太微仙君功過格》《文昌帝君陰陽文》為例〉，《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5期。

喜多田久仁彥，〈唐通事の教本について—《小孩兒》《養兒子》の教本としての特徴〉，京都外國語大學，《研究論叢》LVIII，2001。

萬晴川，〈明清小說與善書〉，《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

廖肇亨，〈領水人的忠誠與反逆：十七世紀日本唐通事知識結構與道德圖式探析〉，收錄於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7。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卷3期，1999。

戴健，〈試論雨花香與通天樂的勸善思想〉，《揚州大學學報》10卷6期，2006。

# On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Yang erh chi* and *Hiao hai erh*, the Japanese Toutuuzi textbooks during the Edo period(1603-1867)

*Hsu, Li-F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Yang erh chi* (養兒子) and *Hiao hai erh* (小孩兒), the Japanese Toutuuzi textbooks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e Japanese Toutuuzi textbooks display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poken language, namely, the dialogues and explanation. The written characteristics involved are also apparently related to the narrative from of hua-pen novels of the Chinese Ming and Qing Dynastic eras.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ua-pen novel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Sino-Japanese popular literature during the Edo period.

**Keywords** : Toutuuzi, hua-pen novel, explanation, storytelling person, Prologue

收稿日期： 99.04.16

接受日期： 100.06.30

---

\* Professor, Dept.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